

我与新时代

思考经济的时代议题

——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

祝伟

北大承泽园内，海棠正值花期。在庭院正中的一间办公室里，头发银灰的黄益平已伏案工作良久，为晚上与“日本物价研究第一人”渡边努的交流而忙碌着。

今年年初，黄益平出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。不久后，他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，继2015年之后再度入选。接连担任两个备受瞩目的职务，让他迎来高光时刻。负责他日程安排的秘书胡晓雯说，黄益平现在比过去更加低调，很少接受媒体采访，尤其是关于自己的“个人叙事”，他思考更多的是经济的“时代议题”。

几十年来，从本土走向海外，从学界转向业界，最后又回到脚下这片熟悉的土地，回归一个学者的身份，黄益平奔走、扎根在经济研究第一线，用脚力、脑力和心力来观察、理解中国经济，始终不变的是他对改革的热忱和担当。

现实关照

黄益平在浙江余姚的农村长大。年轻时，当别人把人生理想确立为科学家、教师或者企业主时，他只想成为一名生产队会计。改革开放后，生产队解散，他调侃自己“职业生涯还没有开始，理想就已经破灭”，于是就去考大学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，农业领域改革是经济社会领域的热点。在大学，黄益平的专业是农业经济学。198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，因为一心只想做农村政策分析，他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，主要工作是研究、试点粮食体制改革。

直到今天，黄益平依然认为，尽管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时间不长，但却是他“一生中收获最大的阶段”。“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。”黄益平说，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在工厂、农村工作生活过很多年，了解基层的情况，也对改造世界踌躇满志。在那里，他向林毅夫、周其仁、卢迈等同事学习调查研究、政策分析，在河南新乡参与全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试验区的工作，在安徽调查“包产到户”之后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问题，“感觉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。”

正是这段经历，奠定了黄益平此后的学术风格——研究扎根中国的现实问题，关注理论研究的现实价值。“他总是会同你，‘你发现了这个结论，对中国的政策和改革有什么启示和意义呢？’”回忆起跟随黄益平读博士和一起研究的经历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苟琴说，黄益平与其他学者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从来不会为了发表学术论文做研究，而是从经济领域新的现象、新

的趋势出发，试图去理解一个研究对推动中国现实发展的价值和意义。

最近几年，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数字金融领域。“为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？因为我们在金融领域碰到很多现实困难解决不了，很多年一直想解决都解决不了。但后来发现，数字金融兴起以后，有一些问题解决了。”黄益平说，学者的心里必须要有一个现实关照，想清楚为什么、怎么办。“如果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了，全世界都会很感兴趣！”黄益平兴奋地说。

知易行难

黄益平的办公室里，挂着学生朱钦琦送给他的一幅字——“知易行难”，内容是他指定的。他很喜欢这幅字，还特意拍了照片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，并注明“办公室内景，亮点是墙上的字”。知易行难，正是他做人治学的态度。

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，对当时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黄益平产生了很大冲击，这使他意识到“金融和传统的经济活动都不太一样”。黄益平说，农业政策的现实影响很简单，政策好了，粮食产量自然就上去了；政策不好，农民种粮没有积极性，粮食产量就会下降。但是金融危机对一个经济体的冲击是巨大的。这让他对金融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，将关注点从农业经济转向金融领域，认为这将是未来重要的改革议题。

那时，花旗集团向黄益平抛来橄榄枝，这也意味着黄益平要走出“舒适区”，从研究者变成实践者，一切从头开始。但是，能够亲身体验金融机构是如何运作的，更多地接近市场，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。于是，他接受了邀请，并一直在那里工作了9年，担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、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。

“短、平、快”，是黄益平在花旗集团工作的最大感受。尽管都是从事经济分析，但研究目标有很大差异。在他看来，投行要为投资者服务、为客户提供价值，这要求他和同事们不断探索理论分析和现实需求之间的差异，而且市场是瞬息万变的，非常考验研究者的知识积累和反应能力。因为投行的工作节奏很快，所以许多研究报告都不够精细。

因为这种“较真”，黄益平被同事们评价“很像学者”。他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，自己内心更倾向于做一名学者。“本来只想体验一下，没想到一直工作了9年。但我到投行工作的第一天，就知道自己最终是要回归学术的。”黄益平说。

他坦承，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

的人。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，经济快速发展给了他立足经济学界的机会，业界的工作经历让他更好地了解金融的运作、市场的结构，也为他未来的金融研究积累了厚实的实践基础。

后来，黄益平把自己的这段经历总结为“拥抱不确定性”。他鼓励学生，努力做好手头的事情和不放弃寻找热爱的事情，两者并不矛盾。“不确定性是一个挑战，但也会带来许多机会，既然删不掉、躲不开，那就勇敢地迎上去。”黄益平说。

家国情怀

今年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迎来创院30周年。过去30年，这里的学者几乎参与了国内每一场重要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。作为院长，黄益平坦言自己“压力很大”。

他的压力，不仅来自于如何管理自己向管理一个“一流经济学家扎堆”的学院转变，更来自于如何在林毅夫、周其仁、姚洋等历任院长的基础上，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学、科研、智库建设带到一个新的高度。

“他是少有的能同时被学术界、政策研究界、监管部门和企业界接受的经济学家。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黄卓说，这与黄益平曾经在政府研究部门工作过，拥有长期在学术界的经验，后来又担任投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，如今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历有关。正是这样独特的人生经历，“塑造了独一无二的黄益平”。

至今，黄卓仍然对2016年发生在朗润园的那场产业政策大辩论记忆犹新。那一年，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产业政策问题发生争论。黄益平想，既然都是一个学院的同事，与其“隔空交锋”，不如坐下来面对面讨论一次。他作为学术协调人提出这一想法，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欣然接受，并决定全

程直播，于是有了人们看到的那场影响深远的产业政策大辩论。

很多人经常问他，作为院长，如何协调不同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和争论？黄益平说，有时候他自己的研究也会受到其他同事的质疑，但“和而不同才是健康学术环境的表现”。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，同样的改革议题，不同经济学家之间相互辩论已经司空见惯，但可贵的是不伤和气，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文化，他有责任将这种文化传承下去。

“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有许多资深学者，我刚来工作时他们是我的偶像，我快退休了他们还是我的偶像，而年轻学者也将一代代成长起来。”黄益平说，如果一定要为这里的学者寻找一个“最大公约数”，那就是不同年代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来到这里，就是希望为中国经济发展做一番事业。

2021年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由朗润园迁入承泽园时，邀请林毅夫、海闻、易纲和张维迎四位创始人一起同台交流，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一度广为流传。

谈起那天的细节，黄益平说：“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试着提炼了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两条核心文化，一是家国情怀，二是和而不同。易纲老师又在中间加了一条，高度自信；林毅夫老师也加了一条，求同存异。”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30年来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精神。

进入人生的第60个年头，黄益平“唯一的目标”是还能继续有很多时间去研究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，产生一些国际前沿成果，形成一些对国家有用的政策，为改革再尽一把力。

在当前经济背景下，数字经济能发挥怎样的作用？

数字经济有助于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。

过去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是割裂的。我是学农业经济出身，知道以前有个现象是把北方的玉米运到南方是通过“进出口”实现的。因为当时从东北到华南的运输成本太高，把东北玉米直接出口到国际市场，南方再从国际市场上买进，与把东北的玉米直接运到南方相比，这样做成本更低。这个例子说明那时我国的市场没有真正融合在一起，交通运输成本将其分隔开了。

我们做过一项研究，主要看近些年全国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。研究发现，消费价格指数在2013年以前起伏很大，2013年以后突然变得平稳。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电商、移动支付和物流运输的日渐发达。

以常温牛奶为例，线上渠道销售的主要是整箱的常温奶，不拆分卖，线下销售则可以拆开来卖。从全国范围来看，整箱销售的常温奶价格出乎意料地一致，但线下拆卖的常温奶价格差异却非常大。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，线上销售的产品释放出固定的价格信号，消费者只会购买与该价格信号差异不大的产品，如果差得太多，消费者就不会买。这实际上是通过数字技术把全国的市场整合到了一起。物流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网上下单的商品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3天内就能收到。只有这样，整个市场才能结合到一起，全国统一大市场才成为可能。

二手车平台也是如此。消费者只要到平台上买车，就能获得优惠的价格。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叫“套利行为”。这样运作的结果就是在全国形成统一市场。

数字经济有助于缩小地区差异。

我的一个博士生曾做过一项研究，发现农村的农民只要用上移动支付，其收入和就业状况就有可能发生改变。数字技术把全国各地的人都连接起来，哪怕是身处小山沟的种植户，也可以足不出户掌握全国的需求动态，甚至为全国市场生产。

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专门做了一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，把全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、几百个地级市、30多个省级行政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描绘出来。2011年，沿海地区的数字普惠水平最高；但到了2021年，全国其他地区数字普惠水平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。这10年间，数字普惠金融增速最快的是中西部地区。这些地区原先没有金融服务或者金融服务不足，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频率和数量也比不上沿海发达地区。然而这些地区的金融服务实现从无到有，其意义不可估量，它指出了未来中国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希望。

大家都听说过连接黑河和腾冲的“胡焕庸线”。过去，经济总量的95%以上都在线的东边，现在情况有所好转，但总体格局依旧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。

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显示，这条线所划分出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，数字金融服务已经快速跨越“胡焕庸线”，在广大的西部地区提供各种各样的数字金融服务。

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创新发展。

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是原创技术不多。2022年10月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任学者曾发表了一篇报告，专门分析评估中国在前沿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。研究结果表明，我国前沿技术的知识产权专利数量在过去10年高速增长，在大部分领域已经超过日本和欧洲，在一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。这说明我国的前沿技术创新一直在快速追赶。这两位英国学者还研究了最优专利引用率，中国现在10%的专利引用率与日本、欧洲处在同一个水平，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。但是，中国前沿技术的赶超态势已经非常明显。

(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)

数字

黄益平

生活中的经济学

别小看这“仨瓜俩枣”

杜铭

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账单：一年内共享充电宝消费总额高达1200元。虽然共享充电宝为我们提供了“江湖救急”的便利，用一次花不了多少钱，一旦积少成多，共享充电宝竟会变成让你小小肉疼的钱包“刺客”。

是什么让你的钱包缩水？共享充电宝给我们提了个醒：别小看这“仨瓜俩枣”。有个经济术语叫“拿铁效应”或“拿铁因子”，用来指那些生活中非必要却能产生积少成多影响的支出。有人算了笔账：每天2杯咖啡共30元，1年就是10950元，30年累计下来就是32.85万元……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。

咖啡只是用来举例，可以替换成奶茶、共享充电宝、盲盒、手办玩具，以及各种健身卡、会员卡……这些都可能是你的“拿铁因子”。一笔笔开支，每一个单项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，但长年累月下来，林林总总加

起来，数字就让人无法忽视了。“拿铁因子”是怎么产生的？

首先，商家总爱着法子制造各种噱头：限量款、联名款、周年纪念款、定制款……不管你买了多少，衣柜里衣服似乎总是少一件。从曾经风靡校园的“小浣熊”干脆面里的108款水浒英雄卡，到某连锁快餐品牌开心乐园餐赠送的玩具，再到如今无穷无尽永远也集不齐的盲盒，商业鬼才总有办法让消费者欲罢不能。甚至当你面对一件昂贵的商品犹豫不决时，巧舌如簧的推销员会劝说你“几年用下来，平均每天只花几元钱”，减轻你对钱包缩水的负罪感。

其次，消费者缺乏正确的理财消费观念。要么控制不住“剁手”欲望，买了一堆华而不实、用处不大的商品；要么只图一时新奇，用不了几次就束之高阁。

难怪现在总有人以“精致穷”自嘲：平时看上去光鲜亮丽，可真正需要大额支出时却捉襟见肘，不得不东挪西借；明明收入可观，可一年到头来却总是存不下钱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钱花哪了。

要想积累财富，不得不警惕“拿铁效应”，但也并非无法防范。比如，在出门前准备更充分一点：给手机充满电、随身携带充电宝、关闭不必要的耗电应用延长续航时间、手机电池健康度下降严重时及时更换……从而减少对共享充电宝的依赖。

当然，拒绝钱包“刺客”，并不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“葛朗台”。只是说应该合理规划家庭或个人财产，量入为出，理性消费，尽量减少随意、不必要、不合理的支出，把钱花在刀刃上。老话说得好，“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算计不到就受穷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时下，很多年轻人学会了不再为名牌所

累，热衷于寻找更具性价比的平替，甚至上二手网站淘宝；用自制便当做工作午餐，代替动不动下馆子、叫外卖；旅游也要错峰出游、反向出游，避开价格高涨、体验感打折扣的黄金周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又很“舍得”在个人素质提升、培养兴趣爱好方面不惜下血本。这就是越来越理性务实的表现。

也有人说，钱不是省出来的。其实，开源节流都很重要。很多人挣了钱后大手大脚，不懂得细水长流，最终朝不保夕；反而不少普通人克勤克俭、善于持家，日子越过越有奔头。

对总也攒不下钱的月光族来说，不妨先养成平时记账的习惯，把当天每一笔支出都仔细记录下来，月底、年底再分门别类汇总分析，看看到底有哪些开销属于“拿铁因子”。有了清晰的财务规划，再加上执行力，就能让自己的钱包越来越鼓。

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承泽园新址一角。(资料图片)



北京大学朗润园一角。(资料图片)